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增刊

(布哈林专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73,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6,201—15,200

书号11001·447 定价0.72元

只限国内发行

出版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主编《真理报》。列宁逝世后，他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之一，1988年被苏联当局处决。

布哈林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列宁对他评价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布哈林在理论上有不少创见，同时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列宁指出：要把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关于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和“布哈林案件”，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为了配合研究，特出版一期《布哈林专辑》。本专辑收录了有关研究布哈林理论观点的四篇论文，以及有关布哈林生平、案件、评价等资料。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是初步收录了一部分文章和资料，提供参考。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增 刊

(布哈林专辑)

目 录

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宋洪训 (1)
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	蔡恺民 (37)
1918年列宁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家 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	夏道源 (51)
试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郑异凡 (69)

文 献 和 资 料

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纪要(摘录)(1928年 7月11日)	严 伦译 (90)
对布哈林的审讯(1938年3月5日和7日)	张海滨 夏道源译 (92)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1938年3月12日)	杨彦君译 (124)

外 论 选 载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摘录)[南]普·弗兰尼茨基	胡文建译 (141)
尼古拉也夫斯基谈布哈林	杨彦君译 (157)

让历史来裁判(摘录)[苏]罗·麦德维杰夫张启荣译 (183)

历史事件评介

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逮捕和杀害

列宁的问题杨彦君 (189)

传记资料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布哈林自传郑异凡译 (201)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布哈林”条杨 莲译 (206)

1930—1975年苏联几种《百科全书》有关

布哈林词条选译郑 简译 (223)

布哈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宋洪训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列宁称他为“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①。1906年，布哈林十八岁时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并从事地下工作。1911年，他从流放地逃往欧洲后，在奥地利维也纳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多年。布哈林从青年时代起特别爱好经济理论，在流亡国外的六年当中，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著作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说，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说，从而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在这段时期里，他写了批判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的著作和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布哈林又研究了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写了一些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理论的专门著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在担任俄共（布）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主编《真理报》期间，写了大量的文章和理论著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发表了一些独立的见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宝库。布哈林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能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13页。

实践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当然，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它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从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的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经历了一条不断探索、不断纠正错误、从而使自己的理论变得比较切合实际的道路。在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东西，也有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也是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因此，要对布哈林的经济思想进行剖析，说明哪些东西是正确的，是我们今天可取的，哪些东西是错误的，是我们应该加以否弃的，就必须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本文试图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重要阶段，来粗略地分析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以期共同探讨。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一 十月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列宁的战略思想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小农经济占着相当优势的俄国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并不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期的那样，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工业国家里取得胜利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条件，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被冲破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了胜利。

认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基本历史特点是很重要的，这对确定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途径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甚至象普列汉诺夫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夕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死抱住教条，一再叫嚷：“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等，以此来反对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1918—1921年期间，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里还重弹这类老调。列宁为此写了《论我国革命》一文，驳斥苏汉诺夫的论点。列宁指出，苏汉诺夫等人所唱的非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个论点。列宁认为，这个论点本身固然无可争辩，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他们对革命的辩证法一窍不通。列宁问道：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的俄国人民，在毫无出路处境的影响下，为什么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①

这里充分表现了列宁的卓见和胆识。列宁既没有否定发展生产力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也没有因此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采取创造性的态度来对待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列宁所坚持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先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制度，然后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赶上别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当客观的政治形势已经成熟，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时，如果认为生产力落后，就不去夺取政权，那就是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但是如果认为夺取政权以后可以不去大力发展生产力，只唱高调，专事空谈，表面上“格外”革命而对那种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那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表现。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永久使用，把银行、铁路、外贸、商船以及大工业收归国有，从而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是用“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办法，即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列宁后来把1917年10月—1918年3月这个时期称为“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不幸的”和约。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国家获得了喘息时机，并有可能开始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因此，在俄国这样一个生产力不很发达又遭连年战争破坏的国家里，怎样着手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列宁在和约签订后立即着手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经中央讨论后在报纸上发表，并用小册子形式出版。这就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

列宁当时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是长期的，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幻想，而经济建设任务也不可能解决得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容易、那样迅速。列宁正是根据这个战略思想来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

列宁认为到1918年3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解决，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的反抗也已大体上解决，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大力发展国家

的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为此，必须相应地改变向资本进攻的方法，放慢剥夺资本的速度，甚至“停止一下进攻”。根据列宁的设想，必须在企业中组织对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并在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的同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即把国内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同时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自觉的劳动纪律、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等措施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当时还提出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向德国人学习国家资本主义的口号。

列宁认为，德国当时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得最好的国家，而俄国无论在文化程度方面，在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上和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要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列宁认为，当时的德国和俄国正好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就好象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因此，俄国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

到1918年春，列宁明确得出结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而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因此在国家资本主义里面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农政权已经得到保障的国家。

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以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是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引进国内十分缺乏的资本和外国先进技术，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俄国也只有通过迅速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道路，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如列宁说的：“没有建筑在现代科

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①

列宁关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套战略思想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二 1918 年春布哈林的错误

布哈林由于对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缺乏深刻的认识而坚持一套“左”的主张，特别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反对列宁的意见。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布哈林提出来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考察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有组织的阶段。在那里，工业、金融和政治已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托拉斯。但是布哈林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坚持无产阶级要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办法，用“最坚决的社会化”的方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只有在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的条件下，才能最经济、最有计划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料。

与列宁起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大致同时，布哈林、奥新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也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②，并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提纲》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意见。

布哈林认为，列宁所代表的多数派的主张，是要在“不进一步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②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229—242页。

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部分地恢复这种关系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去巩固和发展生产力，去进行‘有机的国内建设’，这样会走上“危险的道路”，会“加强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从而也“加强反革命势力以及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力量”。在布哈林看来，在世界性的生产力低落的情况下，这种向资产阶级的让步是“不能创造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的。他在《提纲》中说：“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断地避免战斗，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总之，布哈林认为，采取列宁的那条政策路线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会走上执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毁灭道路，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会使苏维埃国家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的危险。

布哈林还在“利用专家”、“实行计件工资制”、“加强劳动纪律”等具体政策方面反对列宁的意见。例如，布哈林在《提纲》中写道：“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会激起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以及先锋队的不满。”

根据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采取另一条政策路线，即不是“依靠让步”，不是“同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相勾结”，而是“只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在国际上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在国内政策上则实行“彻底的社会化”、“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对有学识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实施义务劳动”、“不给专家以高额薪金”、“不实行计件工资制”等等。

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对布哈林的“左”倾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布哈林等人不了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不了解俄国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而乱叫“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打倒”、“彻底粉碎”等革命空谈，这完全表现了在“左”的口号下面拥护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行为的全部幼稚性。

布哈林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与其说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着眼，不如说更多地是从“改变生产关系”的角度着眼。如同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一样，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

当然，布哈林在《提纲》中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提纲》指出：“企业的管理应转交给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的混合委员会。全部经济生活都应当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组织，这些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不要‘有资格的人士’参加，但要企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工会参加。”另外，还提出要“给地方苏维埃以广泛的主动性，不让中央政权派出的委员去限制它们的活动。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阶级的主动性中寻求依靠，应当竭尽全力去发挥这种主动性。”这些意见对于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扩大地方的主动性、防止集权的官僚主义无疑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虽然极其严厉，但是对布哈林本人一直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认为布哈林等人“是些比较好的人，虽然他们不了解形势，但是在知识和忠实方面，却远远超过那些犯有同样错误的平庸之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①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30页。

列宁也从来不把同布哈林的意见分歧无限夸大，而总认为布哈林等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列宁在1918年4月，即和约签订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意见分歧刚刚发生的时候，在一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同他（指布哈林——本文作者）的见解有十分之九是一致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同他的见解有十分之一的分歧，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①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列宁的批评和教育下，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并赞同列宁的主张。此后，他们就解散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组织。

布哈林对于列宁的批评是心悦诚服的。在以后的年代里，布哈林曾一再承认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和1918年春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错误。他在给《格拉纳特百科全书》(1925年)写的自传中说：“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以后的整个时期是列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超过对任何别人的，从我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来说是这样，从我有幸能和他同在一个队伍里，并且他作为一般的同志和人，我有幸能在他的身边来说也是这样。”他在临死前口授给他妻子的《遗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让后人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严厉地对我作出评论吧。我们是第一次沿着一条还没有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一个目标的。”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1页。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列宁在 1918 年春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几乎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就被 1918 年夏天由白卫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发动的内战打断了。

列宁和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展开,在实践上也被战争一笔勾销了。

三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的经济思想

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曾一再告诫说:国际帝国主义不会放下武器,还会尽一切可能来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约的签订不能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喘息时期可能是十分短暂的。

到 1918 年夏天,外国武装干涉者勾结国内白卫分子发动了内战。苏维埃国家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元气,就又陷入内战烽火的包围之中。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重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基地被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占领了,战争带来的国民经济的破坏以及国内经济的多成分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相对软弱,给苏维埃国家在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方面造成了很大困难。苏维埃国家不得不相应地改变整个经济生活。

为了更加充分地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18 年 9 月初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1918 年 11 月 30 日,由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签署了《关于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历史性决定,规定工农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1)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国家;(2)将国家全部生活纳入战争轨道,在粮食、运输业和军事工业方面建立战时体制;(3)进一步加

强集中制和纪律。

这种特殊的战时形势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放弃原来预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改变原先的经济政策和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而采取一些非常的共产主义措施。当时，有些做法甚至超出了需要的范围。正如后来列宁追述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在采取非常共产主义措施方面跑得太远了，超越了需要的范围；我们不得不这样作。”^①

这些非常措施历史上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它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工业方面加速国有化和集中制领导，几乎将中、小工业全部收归国有，工业生产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2）在农业中实行余粮收集制，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有时甚至不仅是余粮，而是一部分必要的粮食；（3）禁止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并建立了一套实物配给制度，连工资也实物化；（4）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取消了对劳动的物质鼓励的措施。

今天，历史地来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在战争和破坏、物质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而采取的临时政策，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把这些措施当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套有效的办法，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倾向：过分强调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即超经济的手段来管理经济，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特别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在分配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

这里还应该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这些错误不是偶然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1页。

的,而是在没有消除“左派共产主义者”错误观点的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保证了军事上的成就,这仿佛又证明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原先一些思想和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左”的思潮流行泛滥。例如,担任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的拉林,狂热鼓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认为这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措施,他还竭力主张取消货币,认为在1919年就可以立即取消货币。

布哈林在二十年代初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可以说也从理论上论证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观点。

布哈林的这部书是专门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经济规律的。布哈林在这本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应当说很出色,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任务也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例如,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阶级联系的解体和生产力衰退的必然性,以及在过渡时期这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城乡关系的根本改变和生产力必然高涨的趋势。他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总前提》一章中谈到:“社会主义必须**建设**。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首先看到**工人组织作用的辩证改变**。非常清楚,随着统治关系的**重新配置**,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然要成为一种**生产组织者的作用**。”列宁在以上两处页边的空白处都作了评注,写着:“非常对!”“非常好!”^①

布哈林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生产过程已“成为有计划地满足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20页。

社会需要的手段”，“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这里，布哈林已经多少表述了后来被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布哈林在该书中阐述的经济思想许多地方明显地带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阐述今天看来有许多是错误的。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经济范畴已经消失，商品、价值、利润、工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就变成成为一些“虚构的值”，以至于在社会主义下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也没有存在的余地。

布哈林在该书第一章中写道：“**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则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就都消失了。**”布哈林由此得出结论：“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列宁对此批道：“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m$ 和 IIC 的关系吗？”^①

布哈林在书中还写道：“**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存在着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社会联系，商品才会是一个普遍的范畴。因此，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而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了产品而失去了自己的商品性质。**”“由此可见，价值这一商品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平衡状态时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过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商品生产和那里已经没有平衡状态。”“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工人’取得的是社会劳动份额，而不是工资。”“……利润范畴以及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2—3页。